

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薪火映黔山

“我们的文化是任何暴力所不能摧毁的，我们广大的肥沃的土地到处都埋着种子，我们的文化与我们的土地和人民永远存在。”这是作家巴金抗战期间写下的铿锵文字。

在14年的抗战历程中，中国抗战大后方的贵州，成为前线的坚强后盾，更是保存文化火种、守护文化根脉之地。既是文物和古籍的庇护所，也是浙江大学等西迁高校学术研究与创新的摇篮。

全国大批文化名家云集于此。他们以文艺的方式，为抗战讴歌、呐喊，揭露和痛斥日本侵略者，浓墨重彩地描绘和表现中华民族的战斗与不屈。贵州各族儿女投身抗战洪流，各种抗战组织纷纷成立，高举文化抗战大旗，以多种形式发动群众，宣传统一战线，共御外敌。此时的贵州，教育机构增多、文化精英汇集、学术氛围浓厚、抗战文艺活跃，成为文艺抗战重要阵地，贵阳还成为战时全国几大文化中心之一。

大后方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 特刊



贵州文物抗战中 贵州省博物馆供图

守护文脉的文艺抗战重镇

弦歌不辍

抗战期间作为大后方的贵州，成为文化教育迁徙的庇护所，大批学校、企业、机构西迁贵阳。由于沦陷区扩大，大量难民涌入贵州，贵阳市内人口由10余万猛增至30余万。

贵州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谢廷秋说：“有浙江大学、大夏大学、湘雅医学院及部分军事院校等20来所高校及一些中学迁入贵州，加上一些文化机构、新闻出版机构等的迁入，形成文化西迁浪潮。提升了贵州社会整体文化教育水准，为推动贵州社会文明的进步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抗战的艰难时期，贵州社会各界腾公房、迁祠堂、搬民房、划拨土地，热情接纳了20来所高校，给经过颠沛流离的师生提供了一个少有敌机骚扰、能安定从事教学和工作的环境，也体现了贵州对人才、教育事业以及中华文脉的珍视与保护。竺可桢、茅以升、张孝骞等一批堪称国宝的专家学者也随之而来，师生们在此度过了抗战的艰苦岁月，潜心钻研治学，不仅保存了教育火种，还融入当地，取得不少学术成果。

北京大学原中文系教授陈平原曾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漫天烽火中，中国大学大规模西迁，大部分教授响应号召，随大学辗转迁徙，且一路弦歌，其精神与气象，值得后人永远追怀与记忆。战时高校西迁保存学术实力，赓续文化命脉，培养急需人才，开拓内陆空间，更重要的是，表达了一种民族精神以及抗战必胜的坚强信念。”

1943年2月，浙江大学部分教师在教学之余，在湄潭成立了“湄江吟社”。社员有数学系主任苏步青、数学系教授钱宝琮、教育学家江问渔、中文系教授祝廉生、胡哲敷，农学院教授刘淦芝等共9人。结社宗旨为“公余小集，陶冶性情”“留一段文字因缘，藉为他日雪泥之证”。吟社定期雅集，每期指定选题，或思念故乡，或记录生活，或描绘美景，或表达科研成功的喜悦，体现了国家危亡时老师的坚定信念和家国情怀以及乐观精神。

浙江大学师生创办了黑白文艺社、拓荒社、新潮社等新文学社团，积极开展各种文艺活动与当地人民交流。大夏大学的墙报《天公报》每周一期，内容丰富，文笔犀利。每次刊出，全校师生争相阅读。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组织话剧演出，其中《血溅九一八》《塞上风云》等剧目真实感人，广受好评。

以高校西迁为代表的文化西迁，打破了贵州的沉寂。带来新的风气和新的观念，贵州的本土文化则以包容和学习的姿态与之交融，催生了抗战时期贵州教育、出版、艺术等长足发展，这是中华文脉历经磨难仍赓续不绝的样本，贵州从“边地”成为文化抗战的重镇。

文艺抗战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中共贵州地下党加强了对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重建的贵州省工作委员会充分利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有利形势，进一步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贵州地下党组织通过所领导的筑光音乐会、沙沱话剧社以及合群体育会艺术部开展音乐界和话剧界的抗日救亡活动，还举办法书画展、千人大合唱等。《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游击队之歌》《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歌曲在贵阳几乎家喻户晓。《放下你的鞭子》《送郎出征》《打东洋》《有力出力》等抗日话剧也拥有大批观众。

西迁贵州的高等院校师生满怀爱国热情，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和爱国民主运动，他们采取多种形式，如开展义卖活动支援抗日将士，在街头演出活报剧、小演唱，宣传抗日救国。

文化星火播撒贵州，一支支文化生力军在这里集结。一大批知名学者、文化名人从四面八方云集贵州，用艺术开辟第二战场，以笔墨重建精神家园，



筑光音乐会到贵阳制药厂演唱抗日歌曲 贵州省博物馆供图

文艺抗战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中共贵州地下党加强了对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重建的贵州省工作委员会充分利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有利形势，进一步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理事长、《贵州文库》副总纂王尧礼介绍，“贵州地处西南几省的中心，是交通枢纽。抗战时期，流寓贵州和取道贵州前往他省的名人很多，丰子恺、叶浅予、徐悲鸿、庞薰琹、关山月、黄宾虹、董希文等，他们在流离播迁中，仍不忘用画笔记下了自己的所历所见。”在他辑录的《抗战贵州图录》一书中，收录有抗战期间来到贵州的外省画家的贵州题材画作约300幅。

以牛鼻子漫画闻名的黄宾虹，将贵阳街头所见创作了100幅漫画，每幅漫画下还题有一句图解诗，图文展现贵阳社会风貌。王尧礼说，在黄宾虹之前，没有人对贵阳作如此全面的描绘。

抗战文化，是历史留给贵州的一笔文化财富。抗战时期艺术家们创作的经典作品和作出的贡献影响深远。谢廷秋谈到，“我们要充分挖掘贵州抗战历史，保护贵州抗战文化。既要珍惜，更要传承。”



丰子恺在创作漫画。贵州省博物馆供图

人物

在贵州度过3年时光的丰子恺 在文艺阵地冲锋杀敌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姚曼

枪，在文艺阵地上冲锋杀敌。”

1939年，丰子恺受聘于西迁途中的浙江大学，为浙大师生讲授艺术教育和艺术欣赏等课程。1940年初随浙大西迁至遵义，在遵义的3年，也是他一生中创作成果丰硕的时期。

丰子恺一家先住遵义罗庄，后迁居狮子桥河边南坛巷，他为新居取名“星汉楼”，《子恺漫画全集》(共6册)在这里完成，他在序言落款署名“贵州遵义南坛之星汉楼”。在遵义期间，他还创作了《续护生画集》《子恺近作散文集》《艺术修养基础》《初恋》《又生画集》《子午山纪游册》等大批文艺精品。特别是他把逃难途中的经历及耳闻目睹受难同胞的惨状写成文章，绘成漫画、宣传画，动员民众积极抗日，鼓舞抗战士气。他创作《急转直下》《黔道》《警报作媒人》等画作和文章为抗战疾呼，甚至走上街头，指导青年在闹市区绘制巨幅抗战宣传画。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贵州护佑了丰子恺及家人，他也以充满激情的创作回报这片热土。1941年正月，丰子恺和朋友到位于遵义的子午山，为仰慕已久的“沙滩三贤”郑珍、莫友芝、黎庶昌扫墓。后将此行所创作的诗文、漫画编辑成册，取名《子午山纪游册》，共收录诗词25首，文章6篇，漫画13幅。漫画全部为丰子恺所绘。

为画好黔北一带的山岭，丰子恺还专程到金鼎山庙里住了几天，观察一天中山景变化写生创作，创作出“青山不语，残月当门”“白云无事常来往，莫怪山僧少送迎”等生动有趣的画幅。

1941年9月，丰子恺的二女儿丰林先嫁给了浙大生物系的温州籍学生宋慕法。丰子恺幼女丰一吟后来在《爸爸丰子恺》一书中称是“我们逃难以来的一桩大喜事”。婚礼在遵义的成都川菜馆举行，丰子恺书写结婚证书和制作来宾签名册，浙大教授、著名数学家苏步青担任证婚人。浙江大学的不少学者、教授、在遵义的文化界名人出席了婚礼。

1942年冬，丰子恺应重庆国立艺专之聘而由遵义渝。

80多年过去了，人们透过丰子恺的作品，重温抗战历史，仍然能感受危难之际植根于民族心灵深处的坚韧与希望，理解“不做亡国奴”这一誓言背后的血与泪。

文通书局图书目录。 资料图片

文通书局在贵阳发行的图书。 资料图片



文通书局的拣字车间。 资料图片

贵阳文通书局：将贵州声音传向全国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姚曼

贵州盐商华之鸿创办于1909年的贵阳文通书局，堪称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的先驱。书局以“文以载道，通达心灵”为志向，刊印的第一本铅印书是“西南巨擘”郑珍编纂的《播雅》，第一部石印书籍则是贵州最早的英文教科书。

自创办到全面抗战爆发时的20多年里，位于贵阳王家巷附近的文通书局承担了贵州社会主要的印刷出版业务，以其先进的技术和丰富的图书种类引领贵州的文化发展。据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图书《贵阳文通书局》编辑梁茂林介绍，“文通书局是近代贵州最早的民营企业，近代西南最大的出版企业，更曾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齐名，被誉为全国七大书局之一。”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贵州迎来浙江大学、大夏大学等大量西迁高校和文化机构，一大批文化名人也汇聚贵州。据统计，当时贵州共有正副教授近300人，其中包括竺可桢、茅以升、贝时璋、苏步青、张孝骞、梅光迪、贺麟、马宗荣、李宗恩、谢六逸、张其昀等名家。与此同时，上海等地的书局与报业纷纷迁往重庆，到贵阳设立分局与分销处，贵阳呈现出战时文化繁荣的局面。

此时，华之鸿的儿子华问渠，已全面接手书局事务。华问渠审时度势后决定利用当时全国人才汇集西南与贵州的机会，改变文通书局因“交通多阻，人才缺乏”而未能实现初衷的局面，于1941年6月建立了文通书局编辑所，将书局重组提升为一个集编辑、印刷、发行三位一体的文化出版企业。

编辑所成立后，马宗荣任所长，谢六逸任副所长。聘请了贺麟、欧元怀、王星拱、李书田等112名全国名家为编审委员，涉及文、哲、历、法、经济、医、图书

管理、心理、教育、国际关系、理工、土木建筑、农林、医药卫生、新闻出版等多个领域。编审委员会的成立，既保证了书稿的来源，又保证了书稿和编审的质量，提升了书局的专业性、科学性和权威性。

随着战争的发展，编辑所出版方针转变为“增加民众之民族意识、国家信仰，提高民族文化，促进民众之现代常识。”编审委员和广大作者热情高涨，各种书稿源源不断。《莎士比亚全集》《经验与教育》《中国新文学教程》《鸦片战争史实考》《民众营养》《贵州苗夷研究》等一大批有影响的书籍相续出版。

1941年到1945年短短的4年时间，据不完全统计，文通书局共编辑出版近200种、约10万余册各种图书，内容涵盖十分广泛。1943年，文通书局获准加入“国定本中小学教科书七家联合供应处”，标志着文通书局已从贵州走向全国，成为七大书局之一。

文通书局除在贵阳设有总管理处外，还先后在重庆、昆明、成都、上海、长沙、广州等地设有分局，推销出版的各种书刊，将贵州的文化声音传向全国。

1941年10月创刊的《文讯月刊》，以“团结抗战，繁荣学术、文艺”为指导思想，由文通书局编辑所编辑出版。1948年12月5日出版第9卷第5期后终刊，前后共出版了9卷55期49册，发表各类文章或译作760余篇。该刊的主编为谢六逸、顾颉刚、白寿彝等名家，撰稿人包括唐弢、李健吾、艾芜、碧野等文化名人，主要发表学术论著、文艺作品、名著提要、文化动态等，不仅记录着文通书局在抗战中的文化担当，更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出版史、少数民族文化，以及抗战文化、大后方文学等方面的珍贵史料。